

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的研究及其 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项元顺 丁俊萍

【摘要】毛泽东十分注重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和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主要通过实地调查,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在分析研究中国农村实际、中国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形势和道路的科学认识以及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规律性认识。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情研究的指导原则、实践方式、理论成果及其重要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情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国情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毛泽东;国情研究;中国革命

【作者简介】项元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丁俊萍,法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京),2021.1.36~50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后,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革命斗争的策略、党的任务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去伪存真、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在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社会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势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不断回应着革命现实需求,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实事求是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形成了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前进方向的思想观点和理论。

一、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国情的指导原则

国情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社会特征和状态。科学地认识本国国情是促进本国发展的基本前提。任何理论或者政策脱离了本国的国情实际都会因“水土不

服”而宣告失败。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希望,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青年革命者也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探索的实践过程中很早就意识到了国情研究的必要,并且对于如何开展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把握提出了一些宝贵的看法,形成了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10]}的观点。他反对那些不经过实际调查研究某个问题而空谈解决问题的人,也反对那些遇事只顾叹气不去解决的人,还反对那些不经

过实际调查研究而遵照本本如何而如何的人,而这些人就是不注重调查研究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很早就重视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他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是他对中国国情研究的指导原则的认识和把握的反映。他认为,空谈、逃避和遵循教条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国情,也无法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还会催生脱离实际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只有“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1]15},才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现实状况,才能够对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命运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把握。

2.“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进一步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1]10}。在他看来,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了解和把握国情的基本途径,但是调查研究不是漫无目的的调查和漫无目的的研究,调查研究需要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就需要以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回应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的实际需要,调查研究才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才是契合中国实际的和有益的。

没有对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的调查研究就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就不能找到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的“来源”和“现状”,就“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11]10}。毛泽东提出的“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开展国情研究的基本途径以及开展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构想。

3. 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11]13}的调查研究,是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相互关系的前提,是制定正确革命斗争策略的基础。只有开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和研究,革命斗争的主力、革命的同盟阶级和革命的反对阶级才能得以明

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研究形成的结论和认识,又在党的实际工作路线和实践当中得以体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以矫正和完善,从而进一步形成正确可行的革命斗争策略。他还指出,“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11]15-116}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国情的把握,既产生于革命斗争实践,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斗争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强调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研究,以及认为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只有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开展中国国情研究的实践来源和实践检验的强调。

4.“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

毛泽东在论述红军内部存在游离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倾向的时候,提到“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12]74},他指出这才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从历史方面考察,着重要求对事物的历史情况进行梳理和把握;从环境方面考察,侧重对事物当下发展的各方面状况的认识和把握。这里反映出毛泽东对于研究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式方法的认识和理解,也正是毛泽东在对中国具体国情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态度——唯物辩证的态度,这是指导他开展国情研究的重要原则。

二、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国情的实践方式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国情的实践过程中,注重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来研究革命运动中的具体问题,也注重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来摸清革命的实际情况以作出正确估计,从而形成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他指出,调查工作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11]13}。他在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和革命态度,以此来明确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为形成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奠定基础。毛泽

东在研究中国实际和革命形势时,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探求规律,他强调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把握革命形势的实际,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并且能够紧扣革命形势的变化动态研究革命问题。

1. 注重实地调查

无论是在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年月里,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的多次的“围剿”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研究和解决革命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疑惑。对于中国革命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十分注重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以此来认识和把握广大农村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阶级状况,而不是遵从“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11]站在革命群众的后头对革命指手画脚。

自1927年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做了不少的实地调查研究。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对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做过实地调查。1927年11月,他又对江西的永新和宁冈做了实地调查。随着红军转战南方各省,毛泽东的实地调查也一路开展起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江西省的兴国县,吉安县的李家坊村、西逸亭村,吉水县的东塘村、大桥村、木口村,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等等,都曾毛泽东开展调查的乡村,其中调查规模最大最详尽的当属寻乌县调查。^[12]通过这些实地调查,毛泽东对革命运动中极端重要的农民问题、农村的阶级剥削状况、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情况、乡市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开展情况等得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并以实地调查的结果作为制定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武装斗争策略的依据,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实地调查中,毛泽东抛弃了对于农民运动的错误看法,意识到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和农民阶级的巨大革命力量。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

衡山、醴陵、长沙^[11]的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得出了与当时对农民运动种种非议完全相反的结论。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进一步指出,“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12]。由此可见,在此之前,党的领导同志并没能认识到农民运动的实际面貌而站在地主方面,因而在开展革命运动时低估甚至抹杀了农民运动的积极性和重要作用,毛泽东本人对于农民运动现实情形的了解也不甚透彻。正是在实地调查中,毛泽东才逐步意识到农民阶级的巨大革命性。

也正是在实地调查中,毛泽东认识到了村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政策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江西省吉水县的东塘村等地的实地调查,使毛泽东对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斗争组织情况和土地分配政策现状有了基本的认识,他也因此发现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分配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以村为单位的分配方式“利于富农不利贫农”^[13]。他据此指出,这样的做法一定要改变。

2. 注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调查和剖析,他注重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真正区分清楚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朋友,从而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打下基础。在国共合作形成之后,面对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的破坏和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中共四大针对革命形势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提出了要争取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工农联盟的正确革命方针,但是当时党内许多主要领导同志仍然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党的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湖南韶山开展农村调查和组织发展当地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划归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将中产阶级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划归为摇摆阶级,将小资产阶级以各自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又细分为左中右三派,他认为游民无产者“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并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15-9]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基本准确的,同时他对“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一问题作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回答,对于阻止党内错误思想倾向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分析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也注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他对富农、中农、贫农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做了准确的区分。他指出富农对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赤贫、次贫的贫农则是运动中“最革命”的成分。^[119-21]他对于农村各阶级社会状况和革命态度的正确分析,为他形成正确的农民运动开展策略奠定了基础,也为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分析井冈山的土地问题时,他同样以阶级分析方法将井冈山农村阶级划分为“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1169]三大部分,他在分析各阶级对于边界土地政策的态度和反应的基础上,认识到由于之前割据地区土地革命“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1169]损害了中间阶级的利益,从而使得中间阶级往往阻碍土地革命政策的实施以及在革命形势低落时极易走向革命的对立面。正是基于对中间阶级立场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井冈山地区没收一切土地并重新分配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弊端,逐渐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且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1286]。

此外,在回答“为什么要做社会经济调查”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

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1113-114]这集中反映了他注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社会调查来研究中国国情的实践方式。

3. 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研究中国国情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探究中国革命存在的内在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国情,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大势的判断、对国内各阶级的分析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上。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继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斗的道路。在面对买办豪绅阶级破坏革命、小地主富农中间阶级反水、革命根据地屡遭围攻和丧失以及红军内部暴露的许多错误思想观点等问题,许多革命同志犯了革命的急性病而对革命前途表示悲观失望时,毛泽东却能够运用全面、客观、变化、发展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真实现状,认识到“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革命的主观力量在革命失败后虽然大为削弱,但是“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反革命力量表面上的声势浩大实际上却受着国际帝国主义的控制,反革命势力内部是矛盾重重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1199-101]正是基于这种对革命形势全面客观的分析,毛泽东才能够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各阶段基本形势和本质,逐渐引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危险中站稳脚跟,开辟革命的新局面。

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3}问题的分析上,毛泽东注重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和办法对国内各阶级及其政治立场进行划分。他指出,地主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则“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必定很快地分化”,或向左成为革命派,或向右成为反革命派;小资产阶级存在对革命持怀疑态度的右翼、持中立态度的中间派和持支持态度的左翼;半无产阶级对革命也持支持态度,但是革命性弱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是“最进步的阶级”,同时也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游民无产者则存在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3-9}总之,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内各阶级时,注重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对革命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的朋友以及革命的主要敌人作出了明确的划分,同时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中革命的可能朋友和敌人进行了正确区分,并且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作了细致的区分。这为中国共产党在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斗争过程中逐渐探索出正确的阶级斗争路线和革命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指导。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的险恶意图充分暴露,这一重大的时势变化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新的变数和重大影响,毛泽东认识到“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1]52}。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企图将整个中国推入殖民地的深渊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51}。在分析国内各阶级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立场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到全中国的独立和生存时,革命和反革命阵线中可能发生的变化。他指出,在反革命营垒中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是动摇的,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时,“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1]45},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1]45},这也是反革命营垒在民族危急关头的破裂;此外地

主买办阶级内部也存在不同派系的利益冲突,这更加剧了反革命营垒的分崩离析。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吞,广大农民、学生、少数民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坚决要求反抗的,革命阵线会因此而愈加巩固,革命运动也将激烈开展,“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1]51}。正是在全面客观的分析判断基础上,毛泽东继续论证和说明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必要性,这为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前提。

三、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国情的理论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并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各个阶段的革命形势,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正是在科学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任务、方法、前途命运等的正确认识,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实践和认识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1. 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缺乏斗争经验,在同国民党合作期间存在忽视农民力量的倾向,在开展土地革命过程中也存在政策过激的错误。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即没有正确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在实地调查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形成了较为准确科学的认识。

首先,在敌我关系上,他认识到,对内压迫剥削劳苦大众、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势力的大地主、大军阀、大官僚们组成的地主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反动的敌人,对其是要采取坚决的斗争策略的。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则是新的最大的敌人,对其是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予以打击消灭的。

其次,在各阶级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分化方面,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也形成了客观准确的认识。农村中间阶级的“反水”^[1169]问题,引起了他对农村中各阶级的详细研究和对红军农村土地政策存在的问题的再认识。农村当中除了大中地主阶级是极端反动的势力,小地主和富农阶级因为有产和占有而成了中间阶级,革命初期将地主和富农一同打击的做法是中间阶级“反水”的重要原因。于是在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农村的革命斗争需要区分处理好对待各阶级的政策,他指出,“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他还认识到,“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12]269-270}同样,在分析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时,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其内部存在的立场分歧,指出中产阶级派别中存在支持革命和反对革命的分化,小资产阶级当中存在左中右三股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期叛变革命、小资产阶级惧怕革命都是现实的例证。

最后,在革命形势的变化运动中,毛泽东动态分析了革命和反革命阵线的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正确的新的革命策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国即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新形势下,他同样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出发,在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同时,也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形势下产生参加革命意愿的可能,以及农民、工人和少数民族参加抗日的可能,作出了肯定。同时,他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矛盾分化趋势的存在。基于对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认识到革命和反革命阵线也将产生相当的变动,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也将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

2. 形成了对革命任务、形势和道路的科学认识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不同程度忽

视农民的现象,甚至有许多人站在农民运动的对立面“指手画脚地批评”^{[11]13}。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并阐明了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4]126}的原理,这为党正确认识并领导农民运动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研究中,切身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真实面貌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2]37}。这是自党的四大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原理之后,毛泽东对这一判断认识上的深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愈发认识到发动农民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这是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却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经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毛泽东认识到根据地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会打击中间阶级,往往造成中间阶级叛变革命,因此在实践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12]269}的正确意见。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东塘等地的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了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的革命政策在乡村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实际“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而“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13]254}。

正是基于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对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紧要革命任务形成了正确客观的认识。在大革命时期,他通过实地考察切实感受到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领导和发展农民运动是推动革命深入开展的重要途径。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斗争实践和实地调查中发现土地革命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打压中间阶级、实际执行不到位而损害贫农等问题,他意识到纠正土地革命政策中的错误并制定正确合理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必要性,这为进一步完善

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于农民运动的严重性和农民运动急剧发展的形势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时期,通过研究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他对于国内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以及全国各地农村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造就了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正确认识,让他能够在大部分同志都因为短暂失利而对革命形势产生悲观情绪的时候认识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7}。同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吞中国的阴谋逐渐公开化的情况下,他对于国内各阶级可能因此产生的变化形成了客观正确的认识,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要将整个中国变为其完全的殖民地的图谋将会造成反动阶级内部的分裂,并促成民族资产阶级向革命转向以及农民、学生等革命力量广泛团结并发动起来的可能。他基于对当时及未来革命形势的判断,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破裂的教训的基础上,他着重强调“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台柱子”作用。^{[1]157}可以说,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正确把握了变化着的革命形势并提出了相应的斗争策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认清革命形势、把握中心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客观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基础上,毛泽东将革命的敌人和革命的朋友区分清楚,并指出工业无产阶级应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可以作为朋友,并合理区分了中产阶级中可能支持革命的左翼和可能反对革命的右翼。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准确的。在客观分析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把握帝国主义之间在中国存在矛盾、反动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矛盾的实际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条件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阐发,在土地革命时期逐渐探索并形成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完全殖民地的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毛泽东又在把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反应和立场的基础上,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出肯定。他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160}以及可能加入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将在未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为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阶段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3. 形成了对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在科学分析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层面逐渐上升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并且在与革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教训的把握以及其个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基本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对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作出了哲学上的总结和归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的最高水平。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农民地位的逐渐重视和对土地革命政策的发展完善,体现了人的认识是不断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土地革命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正意见,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也逐渐完善,这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再到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土地革命政策的真理性也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1]293}。同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革命策略选择的认识,同样是一个由浅入深、随着革命实践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形成的对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规律性认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多

年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朝着新的伟大征程前进的重要理论原则。

四、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注重运用实地调查、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开展对近代中国国情研究,在正确分析把握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对中国革命任务形势和道路的科学认识以及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等理论成果,并且以此引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实践斗争过程中不断检验和发展这些理论成果,不断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这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1. 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

大革命期间,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注重调查农民运动实际、不重视农民阶级、不注重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导致党对当时广泛兴起的农民运动缺乏领导和重视,使得党的手中没有强大可靠的革命武装,这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大革命失败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党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不仅盲目要求各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坚持城市暴动中心论,对中国社会实际和农民阶级状况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入,没能正确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巨大革命潜力和农村地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左”倾错误的影响导致党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削弱,党的革命事业再度陷入危机。在这样情势复杂的危急关头,毛泽东等人逐渐探索出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为挽救中国革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研究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迫切需

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1]48}他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领导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多次打败敌人的“围剿”,让党在农村地区站稳脚跟,为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实际经验。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他还从中国社会性质、民主革命的影响、与全国革命形势的联系、“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1]50}、党的组织及党的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毛泽东在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为党在革命低潮时期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正确的策略。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解决了国民党军事进攻威胁、土地革命如何开展、革命政权如何建设、革命军队如何建设和如何加强党组织建设等问题,日渐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深刻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只有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98-99}。他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论述,代表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在创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回应和解答了党在革命失败后如何继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选择问题,为中国革命在低潮时期该往何处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才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保存、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逐步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提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在分析把握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形势

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阐释。在统一战线问题方面,他认识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1152]。他还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剧侵吞中国的图谋会对中国各阶级产生巨大震动,中国反动阶级内部可能产生的分化和广泛要求抗日的民众的日益团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以团结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采取团结爱国抗日的民主党派、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举措,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并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武装斗争方面,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了大革命期间党不重视军事工作的错误,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153]这一著名论断,生动阐明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领导革命武装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探索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一步对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在农村地区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和革命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他指出:“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1150]“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1163],武装斗争是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在总结已有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国情实际,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战争,“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543]。他进一步强调,“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544]。在科学把握中国国情实际和推动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提出和坚持武装斗争,并且在领导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一系列武

装斗争的策略方式方法,推动了党在革命战争中由弱变强并逐渐掌握战争的艺术,有力保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党的建设方面,在总结南昌起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客观分析把握党内军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指出了红四军和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必须通过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形势的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1192]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盲动主义等问题;《决议》还强调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党的组织建设,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客观分析把握红四军和党内当时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命题,探索出思想建党、加强党内教育和组织建设等行之有效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在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等思想理论成果,在全党范围内极大地推动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党员教育,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51605-606]毛泽东在把握中国国情实际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法宝。

3. 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锤炼,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发现和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并在推动革命斗争的策略方针走向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检验和完善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实际的深刻把握基础上明确

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道路,领导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总结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逐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在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实际的前提下,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5]604}他基本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脉络,将“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5]634}纳入中国革命的对象,提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经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5]647}。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入剖析和阐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内容。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完整表述出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6],至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基本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更加科学准确的规定,是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论述和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方面,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

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方面,他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国家要采取必要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方面,他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5]675-709}。“三大纲领”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党领导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开拓性地提出和研究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等理论课题,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深入剖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道路等一系列革命基本问题,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方向指导和理论导航。

五、毛泽东研究近代中国国情的启示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把握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国情研究和把握的缩影和典范,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历史方位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是向先辈借智慧、向历史学经验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针的重要保证。

1. 科学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国情的借鉴范本

如何认识开展国情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633}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他注重

运用实地调查、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开展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他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是同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相结合的。在国民革命时期,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区分,对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他也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予以揭示和强调,这是同当时党的主要任务相联系的。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同样基于实地调查资料和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对农村中间阶级的问题和土地分配政策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议。同时,他在客观分析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条件和反动阶级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情的研究始终与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相适应,专注于解决中国革命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为我们当下科学研究中国国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特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鲜明底色。“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在新时代,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需要从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基础出发,着重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成就和问题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对今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大决策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和把握,要抓住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实际。

2. 把握认识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历史阐释

如何形成正确的认识?如何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完善认识?如何以认识促进实践的开展?要真正

研究透这些问题并将之付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设的实践中,需要深入学习和探讨,不注重汲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是不能继往开来的。

毛泽东在研究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对其“不完全性”^{[1][2][9]}进行了完善和发展,这样的过程正是对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向更高级发展又回到实践这一科学的实践和认识发展过程的历史阐释和集注。认识和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对如何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有充足的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向前发展的战略方向、大政方针一定是要从中国最广泛而踏实的实践当中产生的,并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检验完善而向更高水平的认识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攻坚期,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实现更大更长远的发展没有现成的可借鉴样板,拆解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硬骨头的政策措施尤其需要经过广泛全面的试点和不断发展完善,只有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政策措施才具备可行性;同时,在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时,更需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在把握实际问题全貌的基础上,收集归纳人民群众的智慧,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付诸实践检验并不断完善发展之。

正确把握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备的理论品格和工作方法。不懂得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不在实践中检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认识,是无法获得真理性认识的,也无法产生正确的实践。只有通过踏实的实践才能逐渐形成正确的认识,也只有与实践锻炼中才能不断升华正确的认识,使之成为规律性认识并指导更广泛实践的开展。

3.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有益经验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的革命事

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解答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科学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如何科学把握和认识中国国情成了一个问题两个方面,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的。在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方能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而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和依靠力量有着更加深刻而透彻的认识。

梳理和研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对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和历史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就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这个最大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既无法选择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无法直接效仿苏俄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继而实现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转化,于是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需要更加符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革命具体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而形成基于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的关注和把握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成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国情研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社会开展国情研究能够将最广大最根本的中国实际揭示出来。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将获得科学依据和现实思路。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科学合理的国情研究,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同中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不断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和探索,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3.
-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